

燃尽芳华凝馨香

——追记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于瑾

经济日报·中国经济网记者 余 颖

最美教师

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于瑾去世一年多后，她的同事还会在回忆她时失声痛哭，她的学生、同事、家人募集300多万元为她筹建基金，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称赞她的善良、体贴、细心和才华横溢……

9月16日，于瑾教育基金正式揭牌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·默顿教授专程飞来北京参加仪式，并担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。

于瑾生前没有行政职务，也没获得过什么荣誉，去世后，学校追授她“模范教师”称号。但是，在学生、同事眼里，于瑾一直是他们由衷热爱、亲近的好老师、大姐姐，是很多人专业道路的引路人，是改变他们生活最重要的人。

热爱学生的“大姐姐”

在对外经贸大学校园里，于瑾曾经是一道风景——很多学生都叫她“神仙姐姐”，她的课程总是选课系统一开放就爆满，需要抢名额。

学生喜欢于瑾是因为她的课讲得好。

1991年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后，于瑾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国内微观金融教学刚刚起步。时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的林桂军找到于瑾，希望她尽快开设“投资学”这门课。这门课涉及大量数理知识，是她那个年代的学生不曾学过的，晦涩难懂。于瑾果断接下了任务。她开始自学数理经济学，将深奥的金融理论与金融投资实务紧密相连，运用大量的数据及案例辅佐教学。

2008年，于瑾首创的《投资学》课程推出后，引起全校学生抢课，每个课堂都一再扩容。同时，于瑾又围绕这门必修课开设了《证券投资基金》和《证券投资实务》等课程，为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微观金融课程体系打下了基础。

为了开设这些课，于瑾花费了太多精力和时间，但她从来没跟同事提起过。后来，学校引进了大量从事微观金融教学和研究的年轻教师，于瑾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王牌课程《投资学》及备课笔记主动送给新来的教师，自己又开始新的挑战，讲授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》。这门课更传统也更庞杂，没有全面和扎实的金融功底很难讲好，别的教师都不太愿意讲。结果，《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》又被于瑾打磨成一门金牌课程。

学生宋远洋给于瑾当过几年助教。他记得，于老师的课从不重复，每年都要更新教材和课件，她还会特别考虑“80后”“90后”学生的兴趣点，因此深受欢迎。

受欢迎的直接“后果”是，于瑾几乎都没有按时下过课。“每当她宣布下课后，学生不是涌出教室，而是涌上讲台，把于老师层层包围起来。”教务处处长蒋先玲回忆说，“说是两个半小时的大课，但于瑾课后都会留下来为学生答疑一两个小时，答完本科生，还有她的研究生，晚上7点能走就算不错了”。

然而，不管到几点，于瑾都不会拒绝学



(资料图片)

于瑾(前排左二)和学生们在一起合影。

生，她的家人到教学楼下接她，也只能干等。“即使秋天于瑾也常常讲出一身汗，错过饭点儿她的胃就会难受。”蒋先玲说不知道劝了她多少次，但于瑾总是笑着说：“这样学生比较方便嘛。”

教学之外，于瑾还致力于研究新兴市场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。被誉为“期权之父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默顿十分欣赏于瑾的才华，把她的研究成果收录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学材料。

这些年，改行金融行业的机会很多，薪酬很高，但于瑾从没想过要离开讲台。28年来，她为近1.8万名学生开过课，指导培养了94名硕士生和7名博士生，这些学生都成为了我国金融界的中坚力量。直到离世前，于瑾仍在指导14名研究生和4名博士生。

用心对待每一个人

于瑾教授的课讲得好，大家都知道。但她对学生、对同事有多好，却是在她离去后大家一点点拼凑才知道。

时隔一年多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江萍提起于瑾还是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。她带记者来到科研楼715室，门牌上还写着“于瑾教授”。但是3年前江萍就已经在这里办公了，是于瑾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了江萍。

“我那时还是副教授，两个人一间办公室，人来人往很吵，孩子又小，在家、在学校都没法静心办公。”江萍回忆，在一次聊天中，她随口讲起了自己的苦恼。没想到，于瑾当场就说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，而且几天内就腾空了办公室，把门钥匙硬塞给了江萍。

“那以后于瑾在学校便没有了固定办公室，学生答疑、自己申报材料都很不方便。”江萍说，“这件事于瑾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，她的学生每次找她，她都让他们去会议室、咖啡厅，移动办公。一直到她去世，我们谈起她时，学生们才知道原委。于瑾就是这样，默默地关爱着身边每一个人”。

于瑾去世后，很多人聚在一起回忆她，有人说：“我以为于老师只是对我特别好，原来她对所有人都这么好。”

学生何亮宇支教前向于瑾请教，于瑾不仅鼓励他到一线去，还客气地说：“如果你不嫌弃，支教回来可以做我的研究生。”这张口头“支票”，让何亮宇在千里之外的甘肃支教非常踏实。一年后，他如愿成为于瑾的研究生，毕业时，于瑾尽力为他推荐工作。如今，何亮宇已是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负责人。

2001年，学生夏威犹豫是在国内找工作还是出国留学，前来请教于瑾教授。于瑾根据夏威的情况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。得知夏威有经济困难时，建议他采用未来工资现金流抵押、人品信用众筹模式来解决学费。“于老师率先拿出1万元支持。”夏威说，虽然后来家里给了费用，没用上老师们的钱，但于瑾教导的“能为自己的项目融资才是真正学金融的人”一直让夏威记在心里。

于瑾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受过她的关心。她关注学生的朋友圈、生活动态，在他们结婚、生子时会精心挑选礼物，“于老师送给我孩子的衣服，比我家送的都多”。江萍说，“她就是这样用心对待每一个人”。甚至在她走后，家人还从她的书包里发现准备捐给学院患病教师的3000元爱心款……

巨大的“隐形”工作量

近几年，有些高校教师的心思不在教学上，而是放在跑项目、搞科研、办公司。身为金融学教授，于瑾在金融圈20多年，算得上离钱最近的人，但是，她依然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学生身上。

“用淡泊名利形容于瑾，再准确不过了。学校里的荣誉她不争不抢，甚至连博导都不想评，她把机会让给其他人。”蒋先玲回忆，“还是我跟她说，当了博导才能带更优秀的学生，你的那些硕士研究生才能跟着你继续深造，她这才申报了博导”。

于瑾把自己的学生叫作“小朋友”“小可爱”，每到学期最后一堂课，她总是在屏幕上打出“祝小同学们期末考试顺利”。对这些“小朋友”，于瑾像“大姐姐”一样地爱护。

每年开学，于瑾就开始着手为学生们准备十几个论文选题建议，并列出参考书籍。每一个题目，都是经过她阅读思考后定下来的，同时给学生写出开题指导，有时长达数千字；对学生写来的每一封邮件、微信，她都认真解答回复。2017级硕士贾敏读研前曾写过一封邮件，向于瑾请教如何做好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过渡。没想到，于瑾回复了一封1000多字的邮件，从专业课程、英语基础、心态调整等方面，详细列出自己的想法。

这些工作不会留下照片、无法填进表格、更不会成为课题项目，在学校统计工作量时，根本不会被提起，但是，这些“隐形”工作量却成为于瑾留给学生永远的记忆。

对学生的热爱，一直持续到于瑾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2018年5月24日中午，签完最后一份博士毕业材料，于瑾收拾东西回家。近两个月来，因为操劳学生们的论文，她一直休息不好，前一天晚上也只睡了两个小时。看到“小同学们”一个个顺利通过，她开心地跟同事说：“那就歇一阵儿了啊！”

说是歇一阵儿，回到家后，于瑾又通过微信、电话回复了6名学生关于论文修改的问题。最后一个学生收到她的信息是在深夜00:57。此后，她应该是上床休息了。按她一贯的日程表，小憩醒来，她还会继续伏案工作，或为学生答疑解惑，或完善手头的教案。

谁知，她就在此长眠。

“不同于很多经历坎坷的英雄模范，于瑾的生活一帆风顺，家庭幸福。”蒋先玲说，“于瑾待学生、待同事的点点滴滴，都是普通人做得到、学得来，却又无法一辈子都坚持的。在平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，才是于瑾最闪光的地方”。

飞行员郭万清团队：

再远都能把同胞接回家

本报记者 李治国



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郭万清准备执行飞行任务。

(资料图片)

他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接同胞，但他心里清楚，在这里等待已久的同胞，此刻一定最想看到祖国的飞机。于是，郭万清立刻按照任务单信息，拨通我国驻埃及大使的电话，说明情况。在使馆的帮助下，受困的同胞们终于登上飞机。

从枪林弹雨的战区逃出来，同胞们只带了些随身物品，没有身份核对、没有人员查，更没有登机牌，全靠东航随机地服人员现场手写，记录人数。在这一刻，只要是同胞，无论拿着中国护照、我国香港澳门特区护照或者台湾地区证件，都能踏上东航的飞机。

救援任务刻不容缓！接到任务仅4小时，郭万清和同事们就驾机起飞了，经过6个多小时飞行，开罗机场终于出现在郭万清的视野里，同时出现的还有围着机场的驻军坦克和高射机枪。此时郭万清和同事

出，这种遇到危险挺身而出的责任和担当，体现了东航飞行员的初心和使命。

在一次次救援中，郭万清和同事们不断积累着救援飞行的经验，整个东航应急救援能力也在不断提升。2017年9月，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克遭遇严重飓风灾害，381名中国游客受困。郭万清和同事们受命飞往多米尼克接回同胞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从未飞过的大西洋航线，从未有中国航班降落过的机场，和一段穿越19个国家、往返3.5万公里的航程，这也是东航历史上飞越国家最多、距离最远的飞行任务。

接到任务后不到一天时间，东航就获得了全部沿线国家的许可，并建成覆盖全部宽体客机、中国民航规模最大的机上WiFi空中上网机队，如果航路沿线临时出现新信息、新情况，机组能随时通过工作联络群，得到后方的支援。正因为后方的全力保障，郭万清和同事们快速、顺利、平安地将受困同胞接回祖国与家人团圆。

时至今日，郭万清依然记得同胞们欢呼“祖国万岁”！那一瞬间，是身为一名中国飞行员最骄傲最光荣的时刻！

“只要同胞有难，只要祖国一声令下，无论在哪，我们一定把同胞接回家！”郭万清和他的团队成员也没有人退缩。

最美退役军人

在河南睢县潮庄镇程庄村一个农家小院，98岁的陈相林小心翼翼地从柜子底部拿出一块手绢，里边包着4枚军功章和9枚纪念章，它们记录着陈相林老人的赫赫战功。

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陈相林，1946年入伍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曾参加过睢杞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华东战役、华北战役和湘南战役。1950年到1953年，随第二野战军第18军进军西藏，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和援藏建设。1960年，正连职军衔的陈相林转业到四川省省委机关。1962年响应国家精简退职号召，放弃了城市生活和优厚待遇，毅然回到家乡支援农业生产。

回首过往，陈相林最骄傲和自豪的是1948年他参加了粟裕将军指挥的睢杞战役，因为对当地比较熟悉，他被指派为参谋处通信员，负责传达我军作战命令和情报。在最激烈的龙王店战役中，他冒着敌人三次飞机轰炸，传送情报。“当时飞机离头顶很近，能看见炮弹往下落。当时我就想只要没被炸死，就继续执行任务。”在睢杞战役中，因为不怕流血牺牲，出色完成了上级交付的全部任务，陈相林荣获“三等功”。

1948年10月他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18军54师160团，亲身经历了淮海战役的胜利。1949年4月渡过长江以后，他又参加了湘南战役，在湖南茶陵战斗中，他所在的3连一排2班坚守阵地直到最后胜利，陈相林荣获“二等功”。

湘南战役结束后，陈相林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，解放云南、贵州。接着从贵州北上四川，参加了刘邓领导的成都战役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他获得了一枚“解放战争勋章”。

之后随第18军进军西藏，参与和平解放西藏与援藏建设。1957年，西藏反动分子叛乱，陈相林作为干部被调入康定德格武工队，一面平定叛乱分子，一面发动群众，给群众做思想工作。“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五六十名藏族同胞遇到叛乱分子，我一面保护藏民，一面和叛乱分子枪战，根本想不到我能活下来。”在西藏4年，陈相林圆满完成任务。

1962年，陈相林主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回村后，他先后担任生产小队民兵连长、生产大队民兵营长，每年选送优秀青年参军入伍保家卫国。与乡亲们一起兴修水利，挖河修路，平整土地，改良盐碱地，翻土压沙，发展农业生产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陈相林卸去村民兵营长职务，成了一名普通党员，一直务农至今。

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安群告诉记者，陈老做事很低调，村民们从不知道他的这么多事迹，他也没有因为个人原因找过村委会和上级党委政府。

“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军队取得胜利，也只有共产党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”陈相林老人说：“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够幸福的了，现在我四世同堂，孩子们都很孝顺。国家始终惦记着我们，我活得值了。”

大山里每天升国旗

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李幸宜

在陕北高原大山环绕的包西铁路北塬车站一座干净别致的小院子里，每天清晨，一面五星红旗都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，迎风飘扬。

地包西铁路偏远山区的北塬线路工区，担负着包西铁路西社至黄陵南55公里、11座桥梁、9座隧道和黄韩侯铁路3公里线路的养护任务。自2011年包西铁路开通工区成立至今，每天升降国旗已是工区必须完成的神圣仪式。从最初只有8人参加，到现在工区25人全部主动参加，升旗仪式早已融入职工的生活。

1996年，当时23岁的陈建超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“红色之路”西延铁路工作。虽然脱下了军装，但军旅生涯中升国旗的优良传统他却没有忘，他心里一直有在工作岗位升国旗的想法。由于当时西延铁路工作流动性较大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。

2011年，北塬线路工区成立，陈建超被调到北塬线路工区担任工长。从此，陈建超开始带领最初的8人“国旗班”每天在工区升国旗，听着雄壮的国歌声，看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，大伙的精神和工作热情倍增。

北塬线路工区不通公路，每天就一趟通勤车。上班不管距离有多远，只能走路；不管多重的工具，全靠肩扛手抬。为了及时发现设备问题，陈建超和工友们每天拿着专业检查工具，对管辖的设备进行检查。在钢轨上每走1米，就要弯腰低头，把工具放在钢轨上，检查两股钢轨之间的距离和水平是否符合规定。每走10米，还要跪在钢轨上，趴下身看看钢轨是否平顺。每天工作回来，大家都腰疼背酸。但是，工友们都常说，每当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，心头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，工作起来也是干劲十足。

在陈建超的办公室里有个玻璃门书柜，里面整齐叠放着8面国旗，有的已经褪色。“别小看这8面褪色的国旗，它饱含着我们工区全体职工的爱国情怀，它‘目睹了’铁路的变化和工区的发展，在我心中，国旗永远是鲜艳的。”陈建超自豪地说。

在延安工务段和车间的支持下，北塬线路工区小院升国旗已经成为工作和生活的日常，他激励着工友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。

我和我的祖国

在大多数人眼里，飞行员是个光鲜帅气、让人羡慕的职业。“其实，这是一份既平凡又不凡的职业。”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行员郭万清说，平凡，是因为飞行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出发和抵达；不凡，是因为飞行员要保证每一次的出发和抵达都绝对安全，“保证旅客安全出行就是我们的初心”。

经历了几次难忘的救援后，郭万清重新认识到飞行的使命，那就是从“把旅客送得更远”到“再远都能把同胞接回家”。

2011年2月1日傍晚，郭万清被领导叫住：“去开罗，救人！”这句话开启了他和同事们“每逢国家和人民需要，就能飞抵全球任何一个角落”的紧急救援模式。

当时利比亚、埃及等多个国家陷入动荡，中国政府紧急组织当地侨民撤回国，这也是中国民航首次在海外大规模运送同胞。如何在动乱地区安全迅速撤离海外侨胞？对东航人而言，是从未遇到过的难题。

郭万清明白，即便自己和团队都没经验，即使这趟旅程充满未知和艰难，东航飞行员都没有任何理由退缩。

救援任务刻不容缓！接到任务仅4小时，郭万清和同事们就驾机起飞了，经过6个多小时飞行，开罗机场终于出现在郭万清的视野里，同时出现的还有围着机场的驻军坦克和高射机枪。此时郭万清和同事